

甫之涂光社 主编

《文心雕龍》

研究论文选

下

1949—1982

齐鲁书社

1229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

(1949—1982)

上、下册

主 编 甫 之 涂光社

编选人员 郭银星 周 萌

王 月 孟繁华

张君武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5印张 4 插页 779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33—0005—x

I·2 定价：7.95 元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

(1949—1982)

下

主 编	甫 之	涂光社
编选人员	郭银星	周 萌
	王 月	孟繁华
	张君武	

齐 鲁 书 社

1988年·济南

序

——《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牟世金

《文心雕龙》研究，已有“龙学”之称长期流行，这不是偶然出现的。近三十年来，已出版了二十四部专著，发表了约六百篇文章。这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已足说明形成“龙学”的客观条件；特别是近几年来，研究队伍日益庞大，全国多数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有《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各种重要报刊，也大都发表过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现在，成立了《文心雕龙》学会，出版了《文心雕龙学刊》，名副其实的“龙学”势将有新的大发展。为此，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途程，展望一下新的局面，自然是十分必要的。

一

不少研究者早已看到，《文心雕龙》和《文选》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可以说，《文心雕龙》的研究史，从它问世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不过，千多年来虽有不少论者对它做过极高的评价，主要工作还只是一些校刊和评注；在现存大量序跋中，

虽时有精论妙语，也往往点点滴滴，且失之笼统。从20世纪初到解放前的半个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此外还发表了各家论文七十余篇。《札记》的出现，才标志着《文心雕龙》正式研究的开始，它在“龙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范注集前人之大成，直到现在，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基础。不过，这个时期理论上的研究是薄弱的。在当时论者的笔下，一部《文心雕龙》，不外讲文体和修辞二事^{〔1〕}；有的则把《文心雕龙》视为“总括全体经史子集的一部通论”^{〔2〕}；有的自谓阐明了刘勰的“卓识”，但如艺术构思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却只字未提^{〔3〕}。

《文心雕龙》的研究者，经过解放初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刘彦和也就刮目相看了。从1955到1964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

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收获。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由于《文心雕龙》文字上的障碍较大，在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下，张光年、陆侃如、周振甫、赵仲邑、郭晋稀、刘禹昌等，都在此期内做了大量的今译工作。除张光年同志的译文刊于今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外，当时已出版了《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和《刘勰论创作》三种，其它也大都以单篇译文在报刊上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年内发表的一百五十篇论文。《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貌，除表现在论著数量的空前增长外，更反映在新思想、新观点的运用上。正由于多数研究者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重要武器，因而能够对《文心雕龙》的理论意

义和历史价值，开始做一些较为深入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甚多，世界观、文学观、创作论、批评论、文体论、风格论、风骨论、三准论、艺术构思论、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大都有所论及。其中讨论得比较集中的，一是风骨论，二是世界观，三是风格论，四是艺术构思问题；特别是风骨论，除有二十多篇专论外，其它兼论及此的还不在少数。通过这些讨论，对《文心雕龙》理论意义的认识，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了。《文心雕龙》之被重视，能够发展成今天这种大规模的“龙学”，当时的研究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些研究，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吸取和发扬的。

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4〕，可说是《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它第一次向读者揭示了《文心雕龙》的主要成就，使读者认识到《文心雕龙》确是我国古代极为珍贵的一部文学理论遗产。这是因为论者能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站在现代文艺理论的高度，密切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其理论意义，而和解放前一般用古人的观点来评述古人的论著形成鲜明的对照。研究古代文论，必须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发现其价值与不足。刘论在这方面虽还做得并不十分理想，却是我们应首先总结的一条经验。

此期很多论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杨明照的《从〈文心雕龙〉中〈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就是一例〔5〕。论者认为《原道》、《序志》对了解刘勰的思想极为重要，尤其后者是“以取群篇”的总序，“是全书最关紧要的一篇”，“可是，有的同志在论证刘勰的思想时，取材于《灭惑论》的地方反而比这两篇多得多，甚至还有只字未提

的”。论《文心雕龙》的思想而对其关键篇章只字未提，这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研究了。杨论以这两篇为主，再证以全书有关大量论点，然后得出结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思想为儒家思想，而且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但他的文学观是否为唯物的，还不能因此即遽下论断，这就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这都充分反映了论者一向严谨治学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研究，就必须对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调查，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并加以客观的综合分析，才能据以得出较为准确的、合于实际的结论。郭预衡的《〈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6〕，正是这样的佳作之一。它确能道出刘勰评论作家的特点，它不是从某一篇、某几句评语出发，也不是从对少数几个作家的评论着眼，而是从全书，从对全部作家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只有这样探得的“特点”，才能是它本身确有的、实质性的特点。目前古代文论界正在大力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文心雕龙》自不例外。研究特点，就正应发扬郭论之长，而避不力求其实便轻下结论之短。

古为今用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出发点。此期论著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如许可的《读〈文心雕龙〉笔记》〔7〕，其第一个论题就是《文心雕龙是批评文学》，论者针对当时“文学批评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枯燥”的情况，根据刘勰用大量形象生动的描述来阐明理论的特点，提出“批评文学”的主张，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王元化的《〈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8〕，明确地针对当时山水诗的讨论而发，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又如王达津的《刘勰论如何描写自然景物》〔9〕，在具体分析了刘勰的论述之后，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在古为今用这个问题上，虽觉此期研究的深度还并不

理想，但有此良好的开端，却是很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此期研究，应该引为教训的主要有二：

第一是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把古人现代化，对刘勰的理论意义做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如刘绶松的《初探》，前面说过，确是解放初期一篇质量较高的重要论文，但却把刘勰看得太高了，说他“是不会不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的，他是不要求用文学这个武器来为改善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生活而斗争的”。把这种显然是刘勰所不可能有的思想强加给他，在当时的文章中并不是个别的。现在看来，这在研究者初步学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放初期，也许是一种较自然的现象，但这种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取的。另一种现代化的倾向，是把刘勰的种种论点，分别套入现代文学理论的体系中去，完全失去了刘勰理论的本来面目。这两种倾向比较起来，前一种之误，既易为读者发现，也在后来的论述中逐渐消失了；后一种则有较大的迷惑性而至今难以绝迹。把古人的理论分割开，而按现代理论的框框对号入座，这种方法是轻而易举的，但不仅毫无价值，还有碍于认识刘勰自己的理论原貌和特点，自然更谈不到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所以，这是今后应该特别注意的。

第二是孤立的概念之争较多而总体的研究较弱。从总体上来把握其理论或概念的文章，这个时期也有一些。除上述刘、杨、郭诸家之论外，如陆侃如的《〈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10〕}，从全书用语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一些专门术语和一般词语的区别，对于认识刘勰所用概念的含义是颇为有益的。又如舒直的《刘勰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11〕}，从全书许多论述说明，内容形式统一论是刘勰理论的中心问题。这就涉及对全

书理论体系的理解，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惜此论提出后未能继续深入下去。总的看来，当时的研究，还主要是对一些单篇的论析或孤立的概念之争，对综合的、整体的研究，还是注意不够的。1963年底，笔者曾提出这样的呼吁：“我们感到有探讨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必要。目前注意于此的还不多见，我希望《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们考虑这个问题。”〔12〕我现在仍认为，无论是对其概念的理解，或防止现代化的倾向，特别是为了求得对《文心雕龙》的深入理解，都有待于对其总的理论体系的探讨。可惜这个问题提出不久，《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就在十年大乱之中中止了。

二

在“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乌烟瘴气之中，也出现过一些讨伐《文心雕龙》的文章。这自然不全是某些作者的过失，但至少应该说，那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一位身居孤岛的研究者，曾讥此期龙坛“空山不见人”〔13〕；但恨祖国山河君不见，早就“万紫千红总是春”了。从1978年到现在，不过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已出版和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十八部，论文四百余篇；专著和论文，都超过前十年的两倍。从十八部专著的发行总量已达五十多万册（其中有的已三版至十余万册）还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来看，关心此道的人数就十分可观了。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一切，却足以表明：《文心雕龙》的研究队伍空前扩大了，“龙学”已进入一个繁荣昌盛而拥有千百万读者的新时期！

十八部专著可大别为三种类型：一是校注，二是译注，三

是理论研究。

校注方面，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侧重于校；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兼有校注，还辑录了大量有关资料（按出版时间先后列述，下同）。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王本原名《文心雕龙新书》，新版基本上保持原貌。杨本原名《文心雕龙校注》，新版有较大的增补。两书各有特色，其校其注，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新发展、新贡献，杨书则尤为突出。以注为主的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此书深入浅出，除注释词义典实，还注意对理论意义的阐释，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个注本。

译注方面，以译为主的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选译》和赵仲邑的《文心雕龙译注》。译注并重的有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和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以上四种，都从6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了部分单篇译注。现有多种全译本和选译本，不仅对广大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对整个“龙学”的普及和发展，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有关理论研究的著作较多，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詹锳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等不下十种，都对《文心雕龙》研究有程度不同的贡献。这方面论著之多，正是“龙学”大发展的重要标志；今后很可能还要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结合此期大量的论文来讨论，而不少论著也曾以单篇论文发表过，为了避免重复，就不分别列述了。

不过，要对十八部专著和四百篇论文进行任何综述，都是笔者无能为力的，本文也并无这种必要。这里只能就近几年来“龙学”发展的概貌，提供一点情况。

这几年研究的内容，仍以艺术构思论和风骨论最多，这两

方面的论文都有二十多篇。其次是“辨骚”问题、风格问题和刘勰的思想问题，各有论文十餘篇。对这些问题讨论较多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或因其理论意义较大，或因理解上有分歧，或因论者对此有兴趣、有深究等。如艺术构思（包括形象思维）的论文特多，就主要是它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既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文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元化先生首创《神思》为创作论总纲说^{〔14〕}，鄙论继之，并写了《创作论的总纲》一个专节^{〔15〕}。其理解角度虽有不同，却正是在王论的启迪下所做的补充。刘勰自己就说，是乃“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则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艺术构思论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有关“神思”的论文特多，可谓良有以也^{〔16〕}。

风骨论虽仍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不过近年来已有渐趋统一之势。经过长期的论争，多数论者都接受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风骨”是刘勰针对当时文风而提出的审美标准或理想。只是分论“风”、“骨”时，对“骨”的认识尚略有歧议。这应该说是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的一大进展。与此有关的是风格问题，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詹锓先生。他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对全书有关论述做了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风格问题涉及“风骨”、“定势”和文体风格、时代风格的关系等，因而有对“风格”这个概念广狭不同的理解。这就不是什么根本分歧了。唯风骨的性质略为复杂。它和风格有联系。有没有区别呢？有的同志认为，“风骨，这是刘勰对作家风格的质的美学要求”，“他明确揭示‘风清骨峻’、‘文明以健’的风格理想”^{〔17〕}；又认为：“刘勰严密的理论体系使他不会同时设两个篇章探讨同一个问题，继《体性》之后，刘勰特立‘风骨’专章，显然是

由风格问题生发开去，在不同的领域探讨了更为深入的问题。……实则‘铭式经诰，方轨儒门’的典雅一格，便是他心中‘最好’的风格。”^{〔18〕}这里，“风骨”既是一种风格理想，却又不是理想的风格。其中微妙的关系，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辨骚”是近年来研讨较多的一个新问题。其涉及面较广，除对《辨骚》篇本身的评论外，还有对“辨”和“变”的不同理解、刘勰对《楚辞》的态度和评价、此篇属总论或文体论、刘勰的基本文学观和对浪漫主义的态度等问题。因此，《辨骚》篇的研究，和对刘勰整个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有较为直接的联系，近几年的研讨势头，大有继续开展下去的可能。

有关刘勰思想的研究，包括属唯心或唯物、进步、落后或反动，以及儒道玄释等。这方面的研究，继上一时期的纷论而又有所发展。马宏山同志提出的“以佛统儒”论，增加了此期的新内容，也活跃了近年来的龙学论坛。这自然是一种好现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要说明《文心雕龙》的思想，不着眼于它本身的论述，而从《文心雕龙》以外找根据，不过重复二十年前的老路。看不见其全书表现出来的总的思想倾向，只在少数几个词语、概念上做文章，是很难得到什么有实际意义的结论的。研究刘勰的思想，必须明确的大前提，是为了知人论世而有助于研究其文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就觉近年来这方面空道理讲得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却太少。杨明照的《刘勰传笺注》、王元化的《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等，对我们了解刘勰的思想是确有裨益的，而这样的论著却不仅太少，也还研究得不太充分。刘勰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用什么阶级的观点来阐述文学理论，这不能不是我们应研究、应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杨王二论可知，分歧是存在的，一主士族，一

主席族，两说都言之有据，都有充分理由。但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认真研究者，却寥落无几。笔者虽倾向于王说，也认为王说尚存可继续研究之处。除王论外，程天祐的《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19〕}，亦对刘勰家世的研究有新的贡献。王、程二论都据比《宋书》和《梁书》晚出的《南史》，已删“汉齐悼惠王肥后也”、“司空秀之弟也”，以证《宋书》和《梁书》中的此二句不可信。这当然是重要证据之一。但《南史》是宋、齐、梁、陈诸史的节要，其总篇幅约减原书之半，安知上述二语，不是由于删繁就简而省？所以，此证是有待作进一步研究的^{〔20〕}。

搞清这些问题的必要，是出于了解刘勰最基本的思想面貌，而为研究其理论之所必需。至于刘勰的哲学思想，当然也应了解、也应研究，却无必要当作一个哲学家、按照对哲学家的要求来研究。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在历史上，刘勰并不是哲学家，《文心雕龙》更未有意识地研究和解答哲学上的任何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他当作哲学家来研究、来要求，岂非缘木求鱼？任何人也不会反对在必要时联系到其与哲学、宗教有关的思想来研究，但如喧宾夺主，那就事非所宜了。

与刘勰思想相关联的“原道”论，也是近几年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这个“道”，有的认为指儒道，有的认为指佛道或道家之道；有的认为并非某一家的道，而是自然规律；有的又认为指文的本质的体现等。无论指什么道，《原道》既为《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它在全书、在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认真下点力气，拿下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以为是极为必要的。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已表现出某种厌烦情绪，虽可理解，却是不应有的厌烦。那种纯概念地纠缠不已，固然令人生厌，但这是个不能不搞清楚的问题。

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若不知“原道”之“道”为何物，便无“龙学”可言。所以，“不厌其烦”，这里是用得着的。但也可断言，在这个复杂而严肃的问题上，继续玩弄概念游戏是不受欢迎的；抓住只言片语而轻下结论，不做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认真研究，也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过去的风骨论大论战中，少数论者表现出这样的习气：过分相信自己的一隅之见，而不屑一读他人的大量论述。这是今后应该避免的。学术问题，特别是某些重大难题，往往不是靠某一天才的突然发现而解决的；离开前人长期研究的成果，任何个人都会一事无成。所以，无论是研究“原道”或其它，都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既要尊重他人，也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不断前进中得到某些共同的认识。

除以上几个论述较多、争议较大的问题外，刘勰的卒年问题、成书时间问题、《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全书的篇次问题以及“文之枢纽”等，也是近年来提出并正在讨论中的新问题。和上一段时间比较，这几年研究的内容显然是大为丰富多采了，许多过去没有进行研究或研究不多的重要问题，都有了或多或少的研究。如刘勰的美学思想，过去只有于维璋的一篇文章，现则有王达津、缪俊杰等的十余篇。欣赏论或鉴赏论，过去一篇没有，现则有吴调公、刘文忠等三篇。它如文学语言、艺术辩证法、灵感论等，也是前所未有的新论题。此外，还值得提出的，是对刘勰理论体系的研究。

随着“龙学”的发展和深入，探讨刘勰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认识；《文心雕龙》中不少问题的深入，越来越显示出有待对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掌握，也客观地提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这又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

的问题，目前的初步研究情况已显示出这点了。到现在为止，就我所见，对此已有专题论述的共七家：

牟世金：《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21〕}

张文勋：《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22〕}

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23〕}

杜黎均：《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24〕}

马宏山：也谈《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25〕}

贾树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26〕}

李 森：略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27〕}

同是一部《文心雕龙》，但上列七种体系却是七个面目，这是毫不奇怪的。只“风骨”二字，如果从黄侃算起，已有约五十篇文章，历数十年的讨论研究，至今尚难完全统一认识，何况掌握“体大而虑周”的整个理论体系。但也不必把问题看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这里除再次呼吁研究者的略予垂意外，愿献愚见三点：其一，刘勰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它自己的原貌，而不是硬套今人的理论体系，更不是论者的任何主观意图；其二，理论体系应该是理论的体系，它与篇章结构的安排有关，却不等同于结构体系；其三，我们要探究的是其文学理论的体系，它和作者的思想有关，却也不等同于思想体系。如果这几点可以作为研讨体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则可望取得比较一致的研究角度，明确了角度，也许会少走一些弯路，问题就容易解决一点。

三

综观近几年《文心雕龙》研究的概况，无论是校注译释或

理论研究，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分可观的。前一个时期的种种良好学风，在近几年的许多论著中，都得到了更大的发扬。这里仅以《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来略予说明。此书问世后，在“龙学”界震动甚大；虽有某些不同意见的商榷，也是学术问题的正常现象。鄙见以为，从“龙学”史上来看，此书的主要意义和价值，还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独到的见解，做了多少精辟的论述；而其既渊且博的种种论述，也并非无可商榷之处。此书的值得重视，主要还在它为“龙学”开拓了道路，扩大了古代文论的视野，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以多方面的启示。如著者对创作论八说的“案而不断”，无论是否谦词，我看理解为“引而不发”大概是可以的。著者把古今中外有关的论点分别加以列述，而未予融贯综论，其实正是已加融贯的引而不发。八说都是刘勰理论的精华，这就提出许多重要的线索和论题，让我们去思索、去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严谨审慎的治学精神。据笔者所知，王著本不只“八说”，还有几“说”既不愿收入其书，虽几经要求，至今仍不愿付梓，原因就是自认为“不成熟”。读过其《文学风格论》的跋语者会知道，这本书是为写《释〈体性篇〉才性说》准备材料而搜集和翻译出来的；又如《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为了准确理解一个“物”字，著者不仅遍查《文心》全书的用例，且根据大量古训，专写了一篇《心物交融说“物”字解》，以证范注之误，而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这些事实已无须做任何说明，著者的治学精神可见。

其次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钱仲联先生评此书有云：“本书考订的精确，有力地为理论服务。因此全书所提出的各种论点，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它和旧时代所谓乾嘉学派那种为

考据而考据的路子是大异其趣的。”〔28〕这确是王著的显著优点。不过，以我之见，著者与乾嘉学派虽是大异其趣，却又一向是尊重乾嘉学派的。王著正是扬其所长而舍其所短的佳构。在先进的思想指导之下，尊重事实，注重论据，也是治古典文学者应有的态度。本书的言之有据，论证确凿，正发扬了这种优点。尤其著者研究刘勰的创作论，首先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它的原有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29〕，更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研究态度。所谓“实事求是”，对古文论研究者来说，首先就是尊重原意，并努力把它的本来面目搞清楚，舍此而言“实事求是”，若非空谈，便是自欺欺人。

最后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方法”，不少学人是颇为茫然的。大道理或可讲一些，付诸实践者，便不多见。用古人的观点论古人，应该是“五四”以前的事了；用马克思主义论古人，我们有把古人现代化的严重教训。古为今用虽为人所共论，从否定了“抽象继承法”之后，便觉问津者无几；为艺术而艺术，为古人而古人，显然又此路不通。至于融会古今，贯通中外，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更何况用精湛的训诂以探其实，以确切的考据以明其本，用亲手的译文以富其论，以妥帖的比较以究其质，等等。王著之可贵，主要就在统一了这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庶可于此看到它的实体了。正因这样，著者虽严谨如彼，却又大胆如此：敢于揭示刘勰理论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从而探得刘勰的一些最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内核。著者期望此书“在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方面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

这里不是全面的书评，提出以上三点，主要出于“龙学”发